

“镜古孰非殷监呈” ——《钱塘遗事》考述

王瑞来

(日本学习院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 东京都 171-8588)

摘要:本文对迄今为止缺乏研究的《钱塘遗事》,从作者生平到内容价值、编纂特色以及版本源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考述,认为:在宋末元初修史热潮和出版印刷业发达的背景下杂采群书而成的《钱塘遗事》,编纂者从总结宋朝灭亡教训出发,以政治史为主,汇集了大量南宋史料;分条立目的《钱塘遗事》,与编年纪事的《宋季三朝政要》互为表里,洵为值得重视的研究晚宋历史与文化之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关键词:南宋文献;《钱塘遗事》;刘一清;《宋季三朝政要》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4-0139-10

“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山小,五百年间出帝王。”^[1]卷一《天目山谿》《钱塘遗事》如此开篇,以一首谿诗,点出一个王朝在一个地域的开始。

钱塘者,既是江名,又是地名、城名,由来尚久矣。无论何名,以地域言,钱塘就是指今天的杭州地区。因此,以钱塘名书,叫《钱塘遗事》,颇有地方文献掌故的意味。然而,《钱塘遗事》一书,虽然围绕着钱塘纪事,亦非局限于钱塘。北宋处于鼎盛之时为女真人金朝猝然灭掉,不死鸟又在江南重生。南宋立国江南,定都杭州,称为临安,以示不忘恢复中原故地之意。连皇帝都把杭州看作临时寓居之地,称为行在。因此,书名钱塘,重在其地为南宋都城,以钱塘标志时代。而遗事者,乃遗民纪旧事也。关于这一点,《四库提要》概括得还是准确的:“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2]卷五十一《钱塘遗事》

《钱塘遗事》凡十卷,内容可以分为三类。前八卷是名符其实的遗事,仅从这八卷的体例看,与其他记录异闻逸事的野史笔记毫无区别,皆分条立目,叙事

纪人。第九卷则独立成篇,有明确的作者,是南宋王朝向元朝请降的《祈请使行程记》,作者为使节团的日记官严光大。第十卷类似专书,专记科举考试的一系列过程。

关于《钱塘遗事》其书以及作者其人,迄今为止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缺乏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下面略加考索评述,以期有助于认识《钱塘遗事》其书,并有助于南宋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一 作者其人:刘一清与严光大

《钱塘遗事》的作者,历来著录为元代刘一清。这个刘一清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长于考证的《四库》馆臣也无计可施,以一句“临安人,始末无可考”敷衍过去。的确,与普通的文人士大夫的笔记不同,本书没有记录作者本人的经历,因此也就没有可为考索之资的“夫子自道”。对于作者刘一清,我也只能依据零星疑似的史料做些推测,以备知人论世。

清修《雍正浙江通志》于《嘉兴县》载:“郁秀观。《弘治嘉兴府志》:在县东二里,宋咸淳三年道士刘一

收稿日期:2013-04-02

作者简介:王瑞来(1965—),男,黑龙江伊春人,史学博士,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与古典文献学。

清建,元至正二十七年毁。”^[3]卷二二八《浙江通志》虽为清人所修,但这条史料录自明代的《弘治嘉兴府志》。方志递修,史实多渊源有自。这种递修的特点,会让我们使用晚出的方志史料时存有几分安心。比《浙江通志》引述的《弘治嘉兴府志》更早,有明景泰年间进士张宁《方洲集》的记载:“郁秀观,咸淳三年道士刘一清乐洞云,以居宅改创于由拳里。元至正二十六年毁于兵火,地址没入民业,漫不可复。国朝洪熙初,高士沈野云弟子顾真常仍旧额,徙建于白苎里,去一清百三十年,而继绝之人始出。”^[4]卷十八《郁秀道观重建殿宇碑》

这个刘一清身为道士,在咸淳三年(1267),亦即元军进入临安城的九年前,曾在嘉兴县修建过道观郁秀观。刘一清生活的时代与《钱塘遗事》作者当为重合,二者为同一人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此外,元人刘诜《桂隐诗集》有《送刘一清教授入京》一诗:“三月江水绿,君行适京畿。辞亲古所重,而使亲颜怡。江北多杨花,江南莺乱飞。去去事经济,归来树旌麾。”^[5]卷一 这个当老师的刘一清,在文献中也是“微茫信难求”。据元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碑铭》记载,刘诜为江西庐陵人,生于宋咸淳四年(1268),卒于元至正十年(1350),其墓碑铭写道:“宋之遗老钜公,若李公鹤田、肯堂、深斋三公,于先生为母党。尊行一见,即以斯文之任属之。中斋邓公、须溪刘公,于先生为乡先正。”^[6]卷十 须溪刘公为由宋入元之著名文人刘辰翁。辰翁号须溪,溪与清意义相关,我曾怀疑刘一清是否就是刘辰翁,但从现存的刘辰翁著作中,难以寻觅出证据。此外,曾写下生祭文天祥文的王炎午,也在其文集《吾汶藁》有《送右卫教授刘一清北上》一文^[7]卷三。刘诜诗题和王炎午文题中的刘一清教授,当系一人,为庐陵人。尽管王炎午称其为“乡先生”,大概也难完全排除作为《钱塘遗事》一书作者的可能性。

《武林掌故丛编》本于《钱塘遗事》之每卷卷首,均记作者为“武陵刘一清”,与《四库提要》所云“临安人”不同。武陵当为地望,指武陵郡,大体位置在今常德一带,与临安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此“武陵”倘若易为“庐陵”,我们的考证则会又有新的展开。因为如果“武陵”真的是“庐陵”之误,那么,《桂隐诗集》和《吾汶藁》提及的刘一清教授成为《钱塘遗事》作者的可能性则顿然增大。

或许有人会心生疑窦:一个江西人怎么会编纂一部以记载杭州地域为主的《钱塘遗事》呢?质疑自是有理。不过,我也拥有可以反驳这一质疑的旁证。

《钱塘遗事》中引录比较多的一部书叫《古杭杂记》,为元人李有所撰,看书名便知是记载杭州地域的文献。然而,且不论作者是何方人士,至少这部《古杭杂记》的刊刻地是在江西。《四库提要》于《古杭杂记》诗集提要引录该书目录后的书坊题识云:“已上系宋朝遗事,一新绣梓,求到续集,陆续出售,与好事君子共之。”又云:“其书目又别题‘一依庐陵正本’六字,盖元时江西书贾所刊也。”^[2]卷一四四 看来,故国之思几乎是元初弥漫于江南全域的情绪。所以,即使远离旧日的都城临安,也会有记载“宋朝遗事”的书籍出版。当然这也不完全反映书坊的政治立场,而是市场经济使然,书坊借助遗民的故国情思,出版这类书籍以谋取利益。

《古杭杂记》的刊刻地在江西,其流布范围也应当主要在江西。《钱塘遗事》的编纂者正因为容易寓目,所以才会有大量引录。我的这一考证,至少可以说明,《钱塘遗事》的编纂者或者是刊刻者也可能与《古杭杂记》一样,同是江西人。这样一来,就更难以排除上述的刘一清教授作为《钱塘遗事》作者的“嫌疑”了。

对于《钱塘遗事》作者的身份问题,最早曾经引起过清朝乾隆皇帝的关注,他在《再题刘一清〈钱塘遗事〉》一诗的注中写道:“其人始末,史传无考。书则纪南宋一代军国大政,贤奸进退,略于高、孝、光、宁,而详于理、度以后,有正史所不及者。盖似宋时曾任职官,故能谙习掌故如此。而卷端题识‘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视天下于度外,卒至纳土卖国’云云,则又似石隐者流,置身于局外,为庶人之议者。考其踪迹盖在仕隐间云。”^[8]四集卷四十六 “其踪迹盖在仕隐间”,乾隆皇帝的考证也只是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不过,这种推测也有一定的道理。乾隆皇帝的推测可以与我的上述考证合并考量,因为江西的刘一清教授亦为宋朝遗民。

从乾隆皇帝所引《钱塘遗事》书前题识的立场与情绪看,作者为宋朝遗民殆无疑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归纳《钱塘遗事》的特征时说:“大抵采掇宋人说部,削其书名,而不改其书中称谓。”^[9]根据《钱塘遗事》的遗民立场以及杂采群书的特征,我倒是对《钱塘遗事》的作者有了新的推测。

我以为对这个书中题署的作者名,似大可不必凿实。《钱塘遗事》一书,跟《宋季三朝政要》、《宋史全文》等书一样,是书坊在元初追思前朝故国的修史热潮之下制造出的一个产品,而作者之名恐系出于子虚乌有的凭空编造。刘一清者,留一清白在世间之谓

也。这一伪托之名，亦颇可见遗民不与新朝合作的情绪与立场。此一猜测，可视为《钱塘遗事》作者考证之第三说。

此外，《钱塘遗事》中的第九卷作者，倒是有名有姓，可以略施考索。《钱塘遗事》卷九于日记官之下记云：“閤赞严光大，绍兴人。”按，此乃日记官执笔者严光大本人所记。同卷《祈请使行程记》于闰三月初八日载：“日记官严光大特与转武翼郎，升閤赞，添差福建路马步军副总管，福州驻扎。”閤赞当系閤门宣赞舍人的简称。

元人牟巘《陵阳集》有《严光大先天图义序》，中云“严君养晦，心通于《易》”^[10]卷十二之语，似为入元后之事迹。又按，2010年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之北宋画家易元吉《獐猿图》，上载有严光大题诗：“猴居磐石望松隳，鹿占丰川食草腴。我亦沐猴人勿笑，入林即鹿奈无虞。”署“存存斋性初子严光大书于泉山方寸天”款，钤“方寸天”、“丙直日记馆泉山性初子”、“严光大章”印^[11]。印钤中“丙直日记馆”，当为隐括其经历之“丙子日记官”之意，丙子即为祈请使北上之年。于上述新发现之资料中，可以概见严光大入元后的心境，而诗作则更是吉光片羽般的宝贵遗存。

二 从《四库提要》看《钱塘遗事》

品尝美味佳肴，其实厨子是谁并不重要。这一道理，之于本书亦同然。对《钱塘遗事》的作者，实在不必强作解人，重要的是《钱塘遗事》一书自身的价值。

《钱塘遗事》问世之后，迄今为止，对此书做出全面评述的，只有《四库提要》。择要摘录于下：

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最详。大抵杂采宋人说部而成，故颇与《鹤林玉露》、《齐东野语》、《古杭杂记》诸书互相出入。虽时有详略同异，亦往往录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条，二卷《辛幼安词》一条、《韩平原》一条、《大字成犬》一条，皆采自《鹤林玉露》。既不著其书名，其中所载“余谓”、“愚闻”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罗大经之自称不加刊削，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语如目睹，殊类于不去葛龚。又书中称北兵，称北朝宪宗皇帝，称帝□曰嗣君，称谢后曰太皇太后，似属宋人之词，而复称元曰大元，称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国兵，称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语。盖杂采旧文，合为一帙，故内外之词不能画一，亦皆失于改正。然于宋末军国大政，以及贤奸进退，条分缕析，多有正史所不及

者。盖革代之际，目击僨败，较传闻者为悉，故书中大旨，刺贾似道居多。

《四库》馆臣的述评，可以分为几个层次。

其一，综述全书。“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最详”，只此一句话，便将《钱塘遗事》一书的内容高度概括无遗。就是说，《钱塘遗事》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南宋后期，是一部晚宋史的史料集。大体观之，卷一至卷三，杂记南宋立国至中期，亦即高、孝、光、宁四朝史事居多；卷四至卷八，则集中于南宋后期，亦即理、度两朝直至亡国，这部分的份量占去杂记部分的三分之二，无怪乎《四库》馆臣说“叙录最详”。

其二，纪事溯源。“大抵杂采宋人说部而成，故颇与《鹤林玉露》^[12]、《齐东野语》^[13]、《古杭杂记》^[14]诸书互相出入。虽时有详略同异，亦往往录其原文。”《四库》馆臣所云，诚为符实。不过，所列举之书名，主要见于前三卷。根据我的统计，引述最多者，当为《古杭杂记》与《鹤林玉露》，其次尚有《程史》^[15]、《宾退录》^[16]、《武林旧事》^[17]、《咸淳遗事》^[18]等书。而与后四卷所记杂事最有史源关系的文献则是《宋季三朝政要》^[19]。关于这一点，大约只是认真核对了前三卷的《四库》馆臣没有发现。我在《宋季三朝政要笺证》一书的前言中，曾将《钱塘遗事》指为《宋季三朝政要》的史料来源。其实，严密地说，二书何者为源，何者为流，很难断定，《钱塘遗事》抄自《宋季三朝政要》的可能性也并不是绝对没有，详见后述。

其三，批评引述。“既不著其书名，其中所载‘余谓’、‘愚闻’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罗大经之自称不加刊削，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语如目睹，殊类于不去葛龚”，确如所指，书中之“余谓”、“愚闻”及“余亦作一篇”云云，仿佛就是编者刘一清的“夫子自道”。倘若不熟悉所引述的典籍，便极有可能被误导，认为就是刘一清的耳闻目睹，亲口所言。明人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20]在卷四引录《钱塘遗事》卷2的《韩平原》条，将“余亦作一篇”径改作“刘一清诗云”。其实，《钱塘遗事》这条记事原封不动抄自《鹤林玉露》丙编卷六《韩平原》条，连条目名称都没有改易。《鹤林玉露》中的“余亦作一篇云”，的确是南宋罗大经的自指，其下引录的诗也是罗大经所作，但明人田汝成就受到了迷惑，误认为是刘一清的“夫子自道”。“不去葛龚”是《四库》馆臣用典对《钱塘遗事》这一引述问题的讽刺。葛龚为后汉时人，《后汉书·葛龚传》“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之下，唐代李贤注云：“龚善为文奏，或有请龚

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事见《笑林》。”^[21]卷一一〇

其四,指责体例。“书中称北兵,称北朝宪宗皇帝,称帝曰嗣君,称谢后曰太皇太后,似属宋人之词,而复称元曰大元,称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国兵,称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语。”对此,《四库》馆臣分析了原因:“盖杂采旧文,合为一帙,故内外之词不能画一,亦皆失于改正。”

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不是《四库》馆臣,而是乾隆皇帝,他在《再题刘一清〈钱塘遗事〉》一诗的自注中写道:“一清初称元为北兵、北朝,似为宋民矣。其记元师下江州、下安庆则又改称大元,记京城归附则称大兵入临安府。一人之书而前后称谓自相矛盾,实为进退无据云。”^[8]四集卷四十六

与《钱塘遗事》前后出现的《宋季三朝政要》,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字里行间感受到叙述者站在亡宋的立场,却口口声声称“大元”。除去编纂者置身于新朝故国的两难曲笔与矛盾心境之外,客观原因就当如《四库》馆臣所言,是“杂采旧文,合为一帙,故内外之词不能画一”。从这一点来讲,清人陆心源在《仪顾堂续跋》中批评《宋季三朝政要》说的“其所纪既简略而叙次俚俗,全无法”^[22],也可以移来评论《钱塘遗事》。

引述的原封照搬与体例用语的前后矛盾,《钱塘遗事》的这些问题,其实正透露出编纂者的秘密。与大量史料同源的《宋季三朝政要》一样,《钱塘遗事》也是基本根据宋末元初的野史稗编笔记小说抄撮而成,只不过没有像《宋季三朝政要》那样编年叙事而已。我在《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前言就写道:“《宋季三朝政要》的编纂者不是史官出身,缺乏最基本的传统史学训练,不过是书肆迎合江南遗民‘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心理,借以牟利,而抄撮刊刻了此书。当然也不能说书肆纯是为了牟利,也一定有寓故国之思,国可亡史不可亡的理念在。”又指出:“在元代相对宽松的氛围里,不同于以往的官方修史或者是士大夫的个人雅好,十三世纪相继在中国大陆上消亡的金朝与宋朝,作为近代史,由于颇可吸引读者的眼球,所以理所当然地为繁荣的出版业所重视。元代的坊间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史书出版热。”^[19]引述这些话是想说明,《钱塘遗事》也是在当时那股民间史书出版热之下应运而生的一部野史稗编。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问题,《四库》馆臣还是肯定了

《钱塘遗事》的价值:“于宋末军国大政,以及贤奸进退,条分缕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盖革代之际,目击僨败,较传闻者为悉,故书中大旨,刺贾似道居多。”作为遗民,编纂者肯定是经历了南宋末年贾似道长期专政的岁月,但《钱塘遗事》并非作者自述经历,而是杂纂群书,因此,“目击僨败”或得其实,但不能说成是《钱塘遗事》“较传闻者为悉”的理由。较那些自述传闻的笔记为悉之原因,当是由于编纂者有意识地广采博收。至于说“书中大旨,刺贾似道居多”,则无疑是反映了当时遗民将宋朝覆亡归结于贾似道误国的普遍情绪。在这种认识的牵引下,《钱塘遗事》网罗了关于贾似道的大量负面记载。

其五,索幽发微。相对于前面八卷,第九、第十两卷与全书的体例不甚相应,类似专书。如果今天写书,这后两卷大概会归为附录之属。不过,对于《钱塘遗事》为何如此完整地附上这两卷内容,《四库》馆臣却试图探求其中的微言大义。《四库提要》写道:“第九卷全录严光大所纪德佑丙子祈请使行程,第十卷全载南宋科目条格故事,而是书终焉。殆以宋之养士如此周详,而诸臣自祈请以外一筹莫效,寓刺士大夫欤?”

《钱塘遗事》的编纂者是否有如此隐衷含寓,也是见仁见智,无意附之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不过,卷一至卷八,尽管立目分条,讲述南宋朝野的各种逸闻轶事,条目之间,看似彼此独立,关系不大,但排列之际,编纂者显然是有一种基本考虑的。至少,从卷一到卷八,从南宋立国到王朝倾覆,时间顺序清晰。从这个角度看,南宋降伏,应蒙古人要求,向上都派遣图存宗祀的祈请使,而后,蒙古人又驱使南宋太后、幼帝北上。在事态发展时序上,第九卷与第八卷所载内容紧密呼应衔接。因此,《四库》馆臣着眼于第九卷与前面的内容关联,自然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第十卷讲南宋科举条格,与前面九卷则缺少内容上的联系。《四库》馆臣的“养士无为”说,多少有些牵强,至多只能算是一种逻辑关联。

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九卷所完整采录的《祈请使行程记》,是同行的日记官严光大的目击纪实,详密细微,独一无二,其他文献无可替代。而第十卷所载科目条格故事,对于宋代、特别是南宋后期科举制度及其相关过程记载极为详尽,也是没有同类文献可以替代的。其独有的价值,于此可以概见。

三 述而不议:《钱塘遗事》价值论

不为貌似地方文献的书名所惑,最早评价《钱塘

遗事》的当属清朝乾隆皇帝，本文标题引用的乾隆皇帝的诗句“镜古孰非殷监呈”^[8]（四集卷四十六《再题刘一清〈钱塘遗事〉》），就明确点出了《钱塘遗事》与所有中国传统史书最为常见的价值，这就是以史为鉴。其实，卷一的题识中已经明确诉说了痛定思痛、总结亡国教训的史鉴意识：“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观是书，不能无所感云。”^[1]不管这段题识出自何人之手，都是最早归纳《钱塘遗事》内容与价值的最早文字。

《钱塘遗事》的前八卷由于是杂采野史稗编而成，所以绝大部分条目所记述的史实可以在现存的文献中找到渊源所自或疑似渊源，但也有一部分史实从现存文献中找不到相应记载。对找不到的这部分史实叙述，可以有两种理解。

其一，原本《钱塘遗事》的记载当时是采自某书，但岁月流逝，所采之书已经亡佚。古代文献的亡佚，并不仅仅限于先秦等年代久远的文献，近世的文献旋出旋亡者亦复不少。比如，《钱塘遗事》在前三卷频频引录的元人李有所撰《古杭杂记》，就只能通过元人陶宗仪所编类书《说郛》的节录来得以部分窥见^①。

其二，除了杂采自野史稗编，有一部分可能确实是属于《钱塘遗事》编纂者自己根据传闻撰写，犹如今日之独家报导，但这一部分估计份量不会很大，因为有九成以上的记载都可以找到相应出处的事实摆在那里。

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找不到文献印证，仅见于此书的记载，可以说是《钱塘遗事》最大的史料价值所在。关于这些史实的记载，《钱塘遗事》就成了源头。后来的引述，不管是否具名，都只是来自这一源头的活水。比如《说郛》对《钱塘遗事》的署名引录，以及明代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中对《钱塘遗事》的大量不署名引录。

我将《钱塘遗事》的记载逐条与现存的文献进行比对，结果发现，间接、类似以及片断的记载不计，大致有如下内容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的完整记载：卷一的《三天竺》、《伍子胥庙》、《射潮箭》、《苏堤赵堤》、《万回哥哥》、《龙翔宫》、《浙江十庙》；卷二的《孝宗恢复》；卷三的《孟保相》、《赵方威名》；卷四的《严覆试》；卷五的《公田赏罚》、《银关先讖》、《甯谢枋得》、《理宗政迹》、《度宗即位》、《全后》、《士人言贾相》、《半闲亭》、《贾相举令》、《贾相之虐》；卷六的《龙飞赋题》、《戏文海淫》、《钱神献梦》、《凉阴三元》；卷七的《相陈宜中》；

卷八的《吕文焕回本国书》、《诏罢兵》等。

上述这些基本不见于他书的条目内容，其史料价值之大自不待言。《钱塘遗事》卷七《相陈宜中》条中的陈宜中《辞右丞相奏》^②与卷八《吕文焕回本国书》条的《回本国书》^③，都成为今人编纂《全宋文》^[23]时采集的主要文献源。

作为辑佚的文献源，《全宋文》的编纂者注意到了此书，但仍有遗漏，比如卷一《伍子胥庙》条所引篇幅并不短的宋人陈公益《重建伍子胥庙记》就失于收录。

《钱塘遗事》中这些关于人物事迹的记载，与他书互相比勘，颇可窥得历史真相。比如卷五《公田赏罚》条记载：“包恢，盱江人，为陆氏学。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路骚然。朝廷除包知平江府，专领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刑。时年已八十，酬劳拜签书而卒。”这是少见的关于理学家包恢的负面记载。与《钱塘遗事》互为渊源的《宋季三朝政要》卷三对包恢评价就很高：“以包恢签书枢密院事。恢学师朱、陆，以道德仪表当世，性疾恶，所至戢奸禁暴，有政声，尤善平寇。平江前为海寇扰，命恢往平之。”而对于《钱塘遗事》所记包恢强行公田令一事，只是作了隐晦记载：“时行公田，恢奉行稍过，颇违公论。”这样的记载，显然是为包恢讳，不如《钱塘遗事》揭示得明确。那么，《钱塘遗事》的记载究竟是载笔者的夸张，还是透露出历史的真实呢？由宋入元的方回在其《桐江续集》卷三十一《送柯山山长黄正之序》中有几句关于包恢的话：“包恢自谓象山之徒，而赞行公田，流祸至今。”^[24]这几句话印证了《钱塘遗事》记载的真实性。像这样的记载，对于今天研究历史真相，可谓弥足珍贵。

《钱塘遗事》的叙述方式也比较有特色，基本上是述而不议。就是说，只罗列出各种各样的南宋晚期世相与人物活动，而不过多加以褒贬。这一点与援引较多的宋人笔记《鹤林玉露》有很大不同。《鹤林玉露》尽管也说人叙事，但是“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9]（卷十三子部杂家），属于理学家言。而《钱塘遗事》则只是说人叙事，鲜有评论，呈现出的是史料的原生态。当然，文字一经落笔，便会留下载笔者的倾向或意识。《钱塘遗事》也不例外。不过，《钱塘遗事》的倾向性与价值判断并不是像宋代的道学家那样直抒胸臆的议论，而是在字里行间的自然流露。这一点很有些《春秋》微言大义的遗风。比如《四库提要》说《钱塘遗事》“书中大旨，刺贾似道居多”，但《钱塘遗事》刺贾似道，很少直接抨击，大多是通过标题或叙事本身来体现。如卷五《贾相之虐》、卷六《贾相讳言》等，都是在标题

显示编纂者的立场,而观其具体叙事,则没有编纂者旁白式的议论。尽管《钱塘遗事》中也可以见到一些夹杂着的少量议论,也几乎不是编纂者所为,而是原封不动抄撮时留下的痕迹。

《钱塘遗事》这种叙事方式的形成,我以为并非是编纂者在主观上有意为之,而是力有不逮。《钱塘遗事》的编纂者尽管有名有姓,但我还是怀疑此书是出自书坊的制作。因此编纂者的文化水准不会很高,无法进行有深度的议论。这种叙事方式的形成,也与《钱塘遗事》杂撮群书而成有关。书坊作书要考虑经济效应,最好是短平快地推出。请高人施以议论,需要出资费时,而且议论倘若触及时讳还有风险,不如不加褒贬,任由读者自会。这样呈现原生态式的叙述方式,对后人使用此书史料较少产生先入为主的干扰与左右,此在客观上亦可视为《钱塘遗事》的宝贵处之一。

与《钱塘遗事》的成书相关,述而不议的方式属于客观形成,然而选择排比并保存史料的主观意识,我认为在编纂者那里则很明确。如《四库提要》所云,是“宋末军国大政以及贤奸进退”。这一叙事限定的时空范围是处于晚期的南宋,而内容则是军国大政,即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王朝存亡的重要事项。

不过,除了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乃至地方史可以从《钱塘遗事》中汲取史料,社会风俗史的史料记载,也给这本书增加了不少名气。比如:卷九《祈请使行程记》中关于“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的记载,就让研究梁祝故事发生地和形成史的学者很感兴趣;卷一的《万回哥哥》对于研究和合神的起源与信仰的产生,也让民俗史学者颇为关注;卷六的《戏文海淫》是一条戏剧史的宝贵资料,在研究南戏起源时常常被提及。

《钱塘遗事》记载的佚闻逸事还丰富了汉语词汇。比如:卷二《东窗事发》条记载秦桧夫妇迫害岳飞,后来在地狱备受惩罚折磨的秦桧,对设醮见到他的方士说:“可烦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钱塘遗事》记载的这件逸事便成为成语“东窗事发”的来源,可惜《汉语大辞典》“东窗事发”条的语源追溯只用了晚出的援引自《钱塘遗事》的明代文献《西湖游览志余》。

传统的笔记随笔,很多都采用分条立目的方式,使读者读其标目而知其内容,标目就是这一则文章的主题或关键词。在传统的史书中,除了纪传体和编年体,还有弥补编年体缺憾的纪事本末体这一史书体裁。这一体裁是宋人的发明^④。《钱塘遗事》与艺文赏

析的诗话类笔记不同,也与学术考订类的笔记异趣,《四库提要》的分类将其明确归在史部杂史类。作为杂史类的史书,采用分条立目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没有明确标示体裁的纪事本末体,完整地叙述了人或事以及诗或文。

四 《钱塘遗事》的来源、成书与版本

《钱塘遗事》的成书时期,亦可稍作推测。

卷四《议迁都》条载:“议迁都,谢皇后请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关于这段记载,《宋季三朝政要》现存最早之元代建安陈氏余庆堂皇庆元年(1312)刊本全同,然稍后十一年即至正四年(1344)之云衢张氏刊本则于“议迁都”与“谢皇后请留蹕”之间多出如下四十五字:“军器大监兼左司何子举言于丞相吴潜曰:‘若上行幸时,则京城百万生灵,何所依赖?必不可。’遂与俱入见,面陈剴切。”而“谢皇后请留蹕”则作“谢皇后亦请留蹕”。据此可知,与本书互为渊源者乃是《宋季三朝政要》初刊本,云衢张氏刊本于文字则有所增益改写。《钱塘遗事》与《宋季三朝政要》初刊本全同,却不同于晚出之云衢张氏刊本。

类似的状况至少还有一处。同卷《吴潜入相》条载:“上议立度宗为太子,公意不欲,缓其事。”《宋季三朝政要》陈氏余庆堂皇庆元年刊本全同,然云衢张氏刊本则于“上议立度宗为太子”与“公意不欲缓其事”之间,有“枢密承旨何子举曰:‘储君未愜众望,建立之议,固当详审。’”二十二字增益。由此亦见云衢张氏刊本对《宋季三朝政要》初刊本之增益修订,而《钱塘遗事》则对这些修订未见遵从。

由这一事实推测,《钱塘遗事》的成书时期,或在云衢张氏刊本《宋季三朝政要》问世之前,所以无法补入晚出刊本追加的内容,自然也就看不到晚出刊本的修订痕迹。当然,出于流通范围的限制,即使晚出刊本《宋季三朝政要》已经问世,《钱塘遗事》编纂者没有看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倘若并非如此,那么我们的推测则可以成立,即《钱塘遗事》成书的时间下限,当在至正四年(1344)。

这一推测还证明了《钱塘遗事》确实是抄自《宋季三朝政要》。对于这一点,我还可以继续举证。在《钱塘遗事》的《四库全书》本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在同一条记事中,常常有不少表示分段的圆圈。笔记小说的每则往往就是一段,一般不再分段。这一事实表明,《钱塘遗事》的前身似乎是一种编年纪事的史书,而《钱塘遗事》的编纂者在抄撮入书时,居然遗留下了这种曾经分段的痕迹,到了后来衍生的扫叶山

房本和《武林掌故丛编》本，这一记号才被消抹得一干二净，不见踪迹。因此说，较为原始的《四库全书》本，还诚实地保留着一些《钱塘遗事》的原貌。而这些遗留下来的宝贵的分段记号，便无意中使《钱塘遗事》的来源露出马脚。这一事实的存在，也间接地证实着《钱塘遗事》抄自《宋季三朝政要》。

不过，话又说回来，《钱塘遗事》中还存在着虽与《宋季三朝政要》同源却较之为详的状况。比如卷八《日蚀》条，在叙述史实部分，《宋季三朝政要》全同，却多出几近完整的诏书。从这种状况来看，就不能断定《钱塘遗事》百分之百是抄自《宋季三朝政要》，当是两者拥有共同的史料源，在入书时，各自视其所需而有所详略增删。

前面在肯定《钱塘遗事》与《宋季三朝政要》初刊本互为因袭关系的前提下，推测《钱塘遗事》当成书于至正四年以前。如果把这一推测保守一些，通过另一个旁证也可以断定《钱塘遗事》至晚成书于至正二十年（1360）以前，这就是《四库提要》提供的旁证。《四库提要》的《钱塘遗事》提要云：“孔齐《至正直记》所列元朝典文可为史馆之用者，一清是书居其一。”不过，《四库全书》并未收录《至正直记》，以其“所记颇多猥琐”而归在存目，仅于《四库提要》对该书作了介绍。根据这条线索，我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的《静斋至正直记》，于卷一的《国朝文典》条果然看到了《钱塘遗事》的书名。包括《钱塘遗事》，孔齐在列举了三十多种书之后讲道：“皆为异日史馆之用不可阙也。”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卷一卷首的识语自署为“至正庚子”，就是说，至少在至正二十年，孔齐已经看到了《钱塘遗事》。因此说，《钱塘遗事》至迟在至正年间成书殆无疑义。

不过，根据《钱塘遗事》与两种版本的《宋季三朝政要》之异同比较，把成书的时期压缩在至正十一年以前的可能性极大。

《钱塘遗事》的内容与《古杭杂记》比较相近，因此在书中才有较多的引录。在《四库提要》介绍《古杭杂记》时分析：“观书首标题，殆《古杭杂记》为总名，而诗集为子目，乃其全书之一集，非完帙也。”由此可知，《古杭杂记》是一集接一集刊行的大型丛书。前面考证作者时已经述及，《古杭杂记》刊行于江西庐陵，《钱塘遗事》也极有可能刊刻于江西庐陵，因而参考《古杭杂记》的几率才比较大。

还有一个旁证，似乎可以印证我对《钱塘遗事》的作者和刊刻地的猜测。这就是，卷八记蒙古征服，除

了记载《京城归附》之外，在众多地方中唯独以寥寥数语单立一条《吉州归附》。吉州即庐陵，单独抽出吉州来立条纪事，是不是编纂者对家乡庐陵情有独钟呢？分条立项见隐衷，这里或许隐藏着作者正是庐陵人的秘密。

指《钱塘遗事》为书坊之作、书坊之刊，还必须解释一下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方可打消疑惑，使人信服。这就是第九卷。

第九卷内立目有二。一为《丙子北狩》，一为《祈请使行程记》。在《祈请使行程记》标目之下，明确注有作者：“日记官严光大录”。而《丙子北狩》的标目之下则不记作者。

题作《丙子北狩》，颇见深意。“狩”字之用，由来久远。《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杜预注云：“晋实召王，为其辞逆而意顺，故经以王狩为辞。”^[25]西汉董仲舒于《春秋繁露·王道》亦云：“晋文再致天子，讳致言狩。”^[26]卷四从此，“狩”即成为帝王被召、出奔或被俘之婉辞。或许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个文雅委婉之辞，坊间之人是否有可能使用。其实，“北狩”是南宋人常用的语汇。宋高宗在诏书中就说：“朕痛两宫北狩。”^[27]卷一〇二《礼志》岳飞《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亦云：“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28]卷十九此均指金人俘宋徽、钦二宗北去之事。这是宋人的亡国之痛，“北狩”二字，人皆耳熟能详。蒙古灭宋，皇室被驱北上，历史重演，使用“北狩”一词极为自然。即使是文化教养程度不高的书坊之人，使用此词亦并不奇怪。故不能以此断定书非坊间所为。

此外，在我看来，《丙子北狩》与紧接在后面的《祈请使行程记》都是出自严光大之手。《丙子北狩》是一份人名录，分别罗列了祈请使及其随行人员中奉表献玺纳土官、日记官、书状官、掌管礼物官、提举礼物官、掌仪官的姓名与所带官职，还记载有两名北朝馆伴使的人名。何以说这部分也是严光大所记呢？在后面《行程记》的闰三月初八日，记有对随行人员的给犒升迁指挥，其中所提及的人名，多数可在《丙子北狩》的人名录中找到。那么《丙子北狩》的人名有无可能是其他人从严光大所录初八指挥中摘出的呢？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丙子北狩》中的人名要多于初八指挥的人名，后人抽出，不可能无中生有。这表明，在出发时严光大记录的人中，在此后的行程中有了逃亡或死亡，所以才没有出现在后来的赏赐指挥中。此外，“狩”虽专用于皇帝，但严光大站在宋朝的立场上，并且行程记的后面也提及到被驱北上的太后、幼帝和

皇室,使用此词,亦不为失当。既然,《丙子北狩》与《祈请使行程记》同为一体,都是出自严光大之手,那么,第九卷就是书坊找到了这份《行程记》资料后,完整地将其附录于书后的产物。

《四库提要》说《钱塘遗事》“世无刊本,传写颇稀”,并不能成为《钱塘遗事》从未刊刻过的证据,只能表明《四库》馆臣未曾寓目而已。元代的孔齐在书中提及,李有、陶宗仪又在自己编纂的书中引述。他们提及和引述的《钱塘遗事》,我以为不大可能只是抄本。

从网上看到一篇提及《钱塘遗事》的文章讲道:“杭州人赵一清著《钱塘遗事》,叙南宋事很翔实,孔齐将之列名《国朝文典》而收藏,这说明《钱塘遗事》应该是杭州雕版刻印的。”^[29]文章不仅把《钱塘遗事》的作者名字误作“赵一清”,对《钱塘遗事》雕版刻印于杭州也是出于毫无根据的想当然推测。这种推测的依据当是《四库提要》所云刘一清为“临安人”。其实,《四库》馆臣也是缺乏根据的推测。

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的《钱塘遗事》刻本,迄今为止,未见有收藏,甚至都没有书目著录。在明代人的著作中,间或可以看到对《钱塘遗事》的引用。如嘉靖年间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的大量引用,卷四万历年间的陈禹谟《骈志》对《射潮箭》条的引用^[30]卷十一,同为万历年间的陈耀文《花草粹编》对《雪词》条的引用^[31]卷二十等等。明人吕邦耀编纂《续宋宰辅编年录》^[32],在书前的引用书目中也明确提到《钱塘遗事》。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全国范围内征集珍稀典籍,抉微发幽,的确让不少湮没已久的典籍重见天日。以前我整理的《朝野类要》^[33]即属此类,《钱塘遗事》也是重现江湖的典籍之一。

《四库全书》收录《钱塘遗事》,来自浙江汪启淑家藏本^⑤。《四库全书》编竣之后,《钱塘遗事》出现了几种衍生版本。较早的为嘉庆四年(1799)云间席世臣校订刊刻的扫叶山房单行本^⑥,而后又有光绪十三年(1887)丁丙辑、钱塘嘉惠堂刊《武林掌故丛编》丛书本。两种版本虽然与乾隆三十七年(1772)校毕而收入《四库全书》之本同出一源,但各有校订,间存异同。近人谢国桢先生评价扫叶山房本云:“刊刻颇精,有知不足斋鲍氏之遗风,丛书中且仅有《武林掌故丛编》之本。此为单行刻本,当为独善。”^⑦通过具体比勘,可知扫叶山房本并非“刊刻颇精”,刚主评价稍嫌过誉。

尽管源出于一,但比较《钱塘遗事》的三种主要版

本,扫叶山房本与《四库全书》本基本一致,曾经担任《四库全书》总校之一的席世臣直接使用的应当就是《四库全书》本。而稍晚问世的《武林掌故丛编》本则与《四库全书》本和扫叶山房本有较大的差异,估计是有所订补。比如卷一《十里荷花》条,扫叶山房本与《四库全书》本最后引诗至“宫殿无人春昼长”,然《武林掌故丛编》本于其下尚有“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盖悼钦宗之不复返也”二十九字。按,《十里荷花》条全录自《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十里荷花》条,但《鹤林玉露》该条也终止于“宫殿无人春昼长”。检寻文献,在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34]卷七十八所记谢克家《忆君王》词中找到了上述文字。这二十九字的补入,显然是出自《武林掌故丛编》本校订者所为。又如同卷《题白塔桥》条,扫叶山房本与《四库全书》本就是一首七言绝句,但《武林掌故丛编》本则于诗前有长达三十字的说明:“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题于壁曰:”检节录《钱塘遗事》的元人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七,亦有这段说明文字,可知扫叶山房本与《四库全书》本均属脱漏。再如卷九《祈请使行程记》,扫叶山房本与《四库全书》本均脱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近百字,而《武林掌故丛编》本则备载。

五 结语

尽管线索稀少,史料匮乏,以上钩玄索隐,对于署名作者刘一清,笔者作出了三种推测性考证:一是嘉兴道士说,二是庐陵教授说,三是书坊托名说,呈现给读者的这三种推测都存在有可能性。不过,文献难征,无法确凿,只能停留于推测阶段。对这三种推测,根据一些旁证的支持,笔者最为倾向庐陵教授说。而对于卷九《祈请使行程记》作者严光大,本文则根据元代文献与新发现之书画题跋,略为窥得入元后的状况与心态,并辑得诗作一首。

对于《钱塘遗事》一书的内容,本文则以《四库提要》的评论为纲,进行了全面考述,并批评了《四库提要》评价的不确之处。同时指出,在印刷出版业发达的环境中,在追思故国的元初修史热背景下,汇集大量野史笔记而形成的这部《钱塘遗事》,许多史料可以找到渊源,与《宋季三朝政要》等同在元初问世的野史拥有互为因袭的关系。同时书中也有一部分史料类似独家报道,或许当时所采的这部分文献已经散佚,而独存于是书。无论可否找到出处,本书所载,都为南宋特别是晚宋的历史与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本书与许多笔记小说相近的分条立目编纂体裁,使这部被归为杂史类的典籍具有了类似纪事本末体的特征,颇便检阅。虽然分条立目如纪事本末,但条目排列从南宋立国到王朝灭亡,则有着大体的时间顺序。本书汇集群书而成,平铺直叙而不假褒贬,但在归纳各条内容的立目上,却寓有编纂者的倾向,体现了元初人的历史认识。笔者认为,直叙其事而少有褒贬,对于读者则较少施加先入为主的影响,这其实也是本书在客观上体现的可贵之处。

除了对作者与内容价值、编纂特色进行了考察之

外,本文还考察了《钱塘遗事》的版本源流。认为本书虽极有可能曾经在元一代刊行,但事实则是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刊本传世,尽管元明两代的文献中对此书间有援引。《四库全书》编竣之后,《钱塘遗事》才衍生出几种版本,主要有扫叶山房单行本和《武林掌故丛编》丛书本。两种版本虽与《四库全书》本同出一源,但各有校订,间存异同。通过比勘,诸本各有优劣,均难称精刻;在内容上,晚出之《武林掌故丛编》本则补订稍多。

注释:

- ①(元)陶宗仪《说郛》节录之《古杭杂记》,见卷四十七。又,明人陆楫编《古今说海》卷一〇五亦有《古杭杂记》节录,然核实条目数量与顺序,可知其转录自《说郛》。
- ②陈宜中《辞右丞相奏》,收录于《全宋文》卷八一六〇,文末所记出处,仅为《钱塘遗事》。
- ③《吕文焕回本国书》,收录于《全宋文》卷二一一二,文末所记出处,首为《钱塘遗事》,其下所列文献有《续宋宰辅编年录》、《西湖游览志余》、《宋史纪事本末》。后三种文献均为明人所编撰,《回本国书》皆录自《钱塘遗事》。
- ④首创史书纪事本末体者为编撰《通鉴纪事本末》的南宋袁枢。
-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钱塘遗事》提要,清乾隆皇帝《御制诗集》四集卷二十一《题刘一清〈钱塘遗事〉》诗句“漫例飞鸿徒号堂”之下自注亦云:“是书为汪启淑飞鸿堂所藏,因假借目送飞鸿事。”
- ⑥席世臣,江苏常熟人,乾隆四十九年以商籍学生充任《四库》三分书总校之一,乾隆五十三年钦赐举人,乾隆戊申进士,家富藏书,史部居多,手校善本,尝刻宋、辽、金、元别史行世。
- 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本《钱塘遗事》书后跋语。

参考文献:

- [1](宋)刘一清. 钱塘遗事[M]. 影印扫叶山房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清)永瑆,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影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清)稽曾筠,等. 浙江通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4](明)张宁. 方洲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5](元)刘诜. 桂隐诗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6](元)欧阳元. 圭斋文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7](宋)王炎午. 吾汶藁[G]//四部丛刊三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8](清)乾隆. 御制诗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9](清)永瑆,纪昀,等.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0](元)牟巘. 陵阳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1]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网, <http://www.polypm.com.cn/index.php?s=Auction/view/ppcd/art70773716>.
- [12](宋)罗大经. 鹤林玉露[G]. 王瑞来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宋)周密. 齐东野语[G]. 张茂鹏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4](元)李有. 古杭杂记(节录本)[M]//陶宗仪. 说郛.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5](宋)岳珂. 程史[G]. 吴启明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6](宋)赵与峕. 宾退录[G]. 齐治平点校//宋元笔记丛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7](宋)周密. 武林旧事[M]. 点校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18](宋)佚名. 咸淳遗事[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9](元)佚名. 宋季三朝政要[G]. 王瑞来笺证//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0](明)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M]. 点校本.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 [21](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 标点本.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2](清)陆心源. 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G].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3]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G].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24](元)方回. 桐江续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5]春秋经传集解[M]. (晋)杜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6](汉)董仲舒. 春秋繁露[M]. 苏舆义证.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7](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8]岳珂. 金佗粹编[M]. 王曾瑜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9]王晓清. 元代杭州人的收藏[EB/OL]. <http://news.artxun.com/zhaomengzuo-1716-8576297.shtml>.
- [30](明)陈禹谟. 骈志[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31](明)陈耀文. 花草粹编[G]//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32](明)吕邦耀. 续宋宰辅编年录[M]// (宋)徐自明.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附录. 王瑞来校补.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3](宋)赵升. 朝野类要[M]. 王瑞来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4](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The Research on *Heritage of the Qiantang*

WANG Rui-la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Oriental Cultures, Gakushuin University, Tokyo, Japan 171-8588)

Abstract: To compensate the deficient research on *Heritage of the Qiantang*,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study on that book including the life of the author, the value of the book, compilation features, versions of the origins and etc.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late So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the trend of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and the booming publication industry helped the publication of *Heritage of the Qiantang*. Based on the fall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compilers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inly focusing on political history. *Heritage of the Qiantang* and *Three Generations of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Song Dynast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and are both precious documents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lat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ritage of the Qiantang*; Liu Yiqing; *Three Generations of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Song Dynasty*

[责任编辑:凌兴珍]